

需要日增，于是錢庄营业逐渐发达；存款放款事項，亦較前繁多。如是年复一年，营业遂蒸蒸日上，大有一日千里之势。拥資产者，皆知錢庄利益稳厚，竞相合股，紛紛組織。所以当时在南北市設立的錢庄极多。1860年8月，太平軍进窺上海，英法各国，均派兵来沪布防。当时南市商业，因战事关系，驟見凋零，錢庄亦大受影响。北市則地处租界，并未波及。

（郭孝先“上海的錢庄”，“上海市通志館期刊”第一年第804頁，1933年）

当太平天国軍勢熾盛时，江浙一帶富紳巨賈，爭趋沪濱，以外侨居留地为安乐土。据統計所示，1860年英、美居留地間，华人已达30万，而1862年，竟增至50万！此种避难的富豪，都不惜以重金获得居留地間一棲止为万幸，西人于是大营建筑的投机，以最迅速的工程，最簡陋的材料，就空地兴建大批房屋，以供給华人居住，而轉瞬間获得千倍的巨大利益。

（徐蔚南“上海在后期太平天国时代”，“上海市通志館期刊”第二年第1502頁，1934年）

租界錢店，当时均系避地官紳所开设，咸丰初年，吳健彰署理沪道，厥后以失守城池案被参，参折中有影借同乡名义在洋場中开设錢店之一款，及奉旨交江南大營戴罪效力，出于向榮之代請，而向之所以为吳營救者，聞向之私財，即寄頓于吳店故也。

（姚公鶴“上海閑話”第161頁，商务1933年版）

昔年票号皆薈萃苏垣，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，資本无此时之巨，专以汇兑为交易而不放长期。軍兴〔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的战争〕以来藏富于官，票号結交官場，是以存資日富。迨东南底定，上海商埠日盛，票号聚集于斯者24家，其放銀于錢庄，多至二、三百万两。

（“答贊阳居士采訪沪市公司情形書”，“申报”1884年1月12日）

（三）1867年上海的金融波动

上海在革命〔辛亥革命〕以前金融界所受的恐慌，不下七八次之多，如开埠以前鴉片战争上海所受的蹂躪，1853年清咸丰3年

小刀会的占领县城，1860年清咸丰10年太平军的进攻上海等数次的军事，上海商业均受其影响，与商业为表里的金融，自亦发生恐慌，然以前对于商业盛衰，极少专书记载，故恐慌的情形，亦仅能作相当的推断。徐愚齋自叙年譜載，1867年清同治6年“冬間，市面大不靖，有某姓坏事倒至四五十万之多，錢业各家，无不被累，有业董張寶楚先生来商，将余土棧房〔堆放鴉片烟的棧房〕契約值六、七万借給轉動，开春如数还来……”，是为上海金融恐慌情形最早的記載。

（“上海市通志館未刊稿”第13編金融編第4項，上海歷史文献图书馆藏）

（四）1871年上海县出示管理錢庄，北华捷報著論反对

〔上海县管理錢庄的內容〕 現在有些刁狡的大小商人并无資产，虛設字号，收受存款，进行放款。无知者受其愚，委托代售貨物或存入款項，托代为經營、累积。迨至騙取的財产已积至若干数目，这些字号的合伙人即关闭店号，各自逃匿，結果許多人被欺騙，有的因此破产，有的因无面目見东家和父兄，不得不流亡他地或自杀了事。……如果被害者向法庭提出訴訟，每每經年累月，毫无結果。此外，这些犯人在逃匿时如有財产不能携之卷逃时，留下来的每被少數被害人不顾別人利益假借洋商名义將貨物提走。这对于商业大为不利。……如不严加取締，此种恶劣行为将如何杜絕？

根据北京当地关于錢庄（銀号）的规定，不論老店或新开，均須五家連环担保，保证书图章式样必須呈繳官厅备案。……如倒欠存款或借入款項，关店逃匿，所有合伙人都可被追訴、緝捕、监禁。如在限期内了清款項，当然免处，予以釋放，否則不論合伙人，經理或經手办事員，都要按盜竊案論罪。如果他們窃取了120两以上，更当从严处分，放逐到边远地区。然后四家連环保人将依次被追訴，負責賠償未了款項。此后，官厅将下公文到犯者的家乡叫他們的家庭負責。……